

命运的轮回 生命的隐痛

——解读《月牙儿》的叙事裂隙

刁丽英^{1,2}

(1. 苏州大学 文学院, 江苏 苏州 215123; 2. 江阴职业技术学院 科技发展处, 江苏 江阴 214433)

摘要:《月牙儿》的文本隐含多重意蕴,在第一人称叙事模式和与此相应的人物“内部聚焦”的和谐表象下,文本呈现出明显的叙事裂隙,从中既可感受到主人公的宿命感和性格缺陷,也可隐约地窥测到作家本人的某种欲曲折传达的生命隐痛。

关键词:《月牙儿》;叙事;裂隙;宿命感;生命隐痛

中图分类号:I207.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5092(2008)01-0043-04

因对底层人物的关注及对传统文化的审视,老舍小说多有咀嚼不尽的意蕴而引起众多研究者注目。标志着老舍思想转变和艺术成熟的经典短篇《月牙儿》是一部具有多重意蕴的作品。读者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切入文本进行阐发,如控诉社会黑暗、批判男性霸权、反思个性解放、隐喻中国传统文人的依附心态等等。但研究界对其主题的阐释多停留在对小说中母女的同情哀叹的感性层面,很少从理性层面对悲剧生成内因进一步深入探究。本文试从叙事学角度切入,探究其叙事裂隙中隐含的深层意蕴。

《月牙儿》是老舍1935年由毁于“一·二八”战火的长篇小说《大明湖》中的一段加工而成的。作家本人声称这是“《大明湖》最有趣的一段”,“由现在看来,我情愿要《月牙儿》,而不愿要《大明湖》了”^{[1]555}。因此,说《月牙儿》是老舍从笔尖上滴出的血与泪,爱与恨的结晶应该不失为过。

文本采用第一人称主人公“我”的回顾性叙事,“我”是故事的亲历者和叙述者。这对惯用全知全能的第三人称叙事模式,以现实主义而称道的作家老舍来说,是一次新的尝试,应该说尝试是成功的。第一人称叙事角度的运用,把作者推到了与读者同等的听众的位置,他和我们坐在一起共同倾听主人公讲述自己的悲苦。通过主人公

“我”娓娓动人地叙述这一辈子的辛酸与血泪,读者从“我”的视角出发,去观察叙述文本中的世界,与主人公一起经历相同的感情的起伏变化,得出相同或相近的结论。把主人公推向前台,使其直接面对读者,这样更容易增加故事的真实性。它容易给我们造成这样一种错觉:这是人物的“自叙传”,这些都是真的。因此,情感叙述较之理性叙述,似乎更能让人信以为真。饱含真情的叙述是引导读者进入故事真实场景的最好手段,但有时也是一种叙述圈套,使读者很轻易就滑入此种圈套而较少理性思考。

如果我们对《月牙儿》作“症候式阅读”,就会发现文本中明显存在的叙事裂隙。细心的读者若对文本的叙事话语作进一步的详细考察,将会发现冷峻、清醒、目光犀利、愤世嫉俗的叙述者思想的深刻性很难与连中学都未毕业的故事女主人公——“我”的娼妓身份相吻合。“我”倾诉着令人心碎的往事,字字句句都浸透着血和泪,但却流露出与“我”的年龄、身份、地位不相称的愤世嫉俗的深刻,面对轻视和侮辱,保持着难得的冷静和清醒。在此,我们不难发现,形式上要求合二为一的叙述者与故事主人公之间事实上却存在着明显的一定程度的分裂。

在《月牙儿》中,“我”最终走上与妈妈相同道路的“无奈”之感就像那个浅浅的月牙儿投下的一抹黯淡阴影,时刻萦绕读者心头。但是当我们

收稿日期:2007-10-12

作者简介:刁丽英(1974-),女,江苏江阴人,江阴职业技术学院讲师,苏州大学在读硕士,研究方向:现当代文学。

在倾听这个故事,当我们跟作者、人物一起沉浸于故事的悲痛沉重氛围中时是否忘记了内心深处冷静的追问?人要追求美好的生活是没有错误的,女人追求美好的生活更没有错误。在《月牙儿》中“我”所生活的那个年代,社会固然黑暗,但在那个社会里苦如“我们”母女的人不止“我”和母亲,可为什么做妓女成了“我们”的唯一选择?除此之外真的就没有别的人生出路了吗?在道德重压之下女主人公屡次为自己开脱,为自己辩解,而所有的辩词颠来倒去都是因为贫穷的社会,“不是我的过错”。然而我们不禁要问:除了受“将人变成鬼”的黑暗社会逼迫之外,人的堕落就没有一点自身的过失吗?

正是从以上明显存在的叙事话语裂隙中,我们可以隐约地感觉到女性主人公背后的另一个匿身的真正的叙述操纵者的存在,可以隐约地窥测到作家老舍本人的某种欲曲折传达的潜在意旨的存在。

二

事实上,文本中关于“我们”母女俩除了卖淫就没有别的生存之路的人生感慨,是由人物兼叙述者“我”的抒情议论中表达出来,而不是由情节设置中自然得出的结果。

首先,先在的宿命感冥冥中引导“我”陷入悲剧命运的泥潭。在“我”卖淫这件事上,“妇人只有一条路走,就是妈妈所走的路”^{[2]245},这种宿命感一直笼罩在“我”的心头。每当“我”的人生遇到挫折的时候,它马上就会浮上心来,成为“我”的生命感悟。类似的典型表述还有“妈妈所走的路是唯一的”^{[2]242}，“我仿佛看得很清楚:有朝一日,我得比她还开通,才能挣上饭吃”^{[2]246}等。妈妈做了暗娼后,面对妈妈的“卖”和嫖客的侮辱“我”束手无策,妈妈是不识字的,但她一再催“我”好好念书,这时其实“我”已无心念书,“小学毕业后又有什么用呢?我和同学们打听过了,有的告诉我,去年毕业的有好几个做姨太太的。有的告诉我谁当了暗门子……”^{[2]238}在这里“我”的“听说”已经预示了“我”的将来。这一情节的设置为以后所有的选择做了铺垫,它使“我”在内心深处有了这样一种潜意识:无论如何“我”都逃脱不了那种命运,那条道路已经横在不远的地方等着“我”,寻觅岔路口的努力只不过是延缓迈出那一步的时间,然而拖延终究阻挡不了现实在背后

的驱动力。即使在“我”还有去饭馆做女招待的这条路可选时(当初“我”并不知道去饭馆做女招待要出卖色相),也已认定妈妈走的路已经在不远处等着“我”了。

然而,文本中的叙事层却不能完全支持这一宿命感。文中,不仅妈妈卖淫的道路是否没有选择余地,叙事不明确;而且,“我”的道路是否没有选择余地,叙事也不严密。比如,妈妈跟馒头铺老板走之前让“我”选择要么代替她卖淫,要么各走各的。可是,为什么妈妈没有尝试别的稍好一点的路呢?为什么不考虑“我们俩”一起洗衣洗袜?为什么不设法让“我”出嫁呢?毕竟,给年轻女孩找婆家是那个年代常规的生存思路。“我”自己选择卖淫之前,也始终没有尝试寻求以婚姻谋生这一生存方式。固然“我”受过男子的骗,可能对爱情失望;“我”了解了“小磁人”在婚姻中的苦衷,不免对婚姻和家庭两方面感到幻灭。但是,理想幻灭与生存挣扎是不同层面的问题。“我”受了一个男人的骗,看了另一个女人的生存苦衷,就绝对不相信爱情婚姻显然有点以偏概全;而且“我”因理想幻灭就不尝试追求现实谋生层面上的婚姻而立即走上卖淫之路,似乎很难证明卖淫是“我”走投无路后的选择,反倒表明也许是“我”先验的宿命感在引导“我”迅速而自觉地走上“卖淫”这最悲惨的人生之路;先验的宿命感使得“我”只盯着这一悲惨结局而对其它生存可能视而不见。在“我”找工作这个问题上,文中交代了“一个多月,我找不到事做”,这一句笼统的介绍并没有排除“我”自己找工作不得法的可能。总之,由于没有在叙事层面上穷尽“我们”母女俩的其它生存可能,议论抒情层面上关于“妇人只有一条路走,就是妈妈所走的路”的哲理,在小说后半部就更像是一个带着一点先验性质的宿命感叹,而不是由叙事推导出的不期然的结论^[3]。

其次,虚荣、倔强、自负、孤傲的性格缺陷和消极的人生态度是“我”悲剧命运的催化剂。

诚然,《月牙儿》中的“我”的美丽而又善良、柔弱不失坚韧的个性赢得众多读者的喜爱,对其悲剧命运一掬同情之泪。然其悲剧结局固然有社会逼迫的必然因素,“我”自身的性格缺陷也是加速其悲剧命运的一剂催化剂。女孩子的虚荣使“我”觉得“我越往大了长,我越觉得自己好看,这是一点安慰;美使我抬高了自己的身分”,“穷,可是好看呢!”^{[2]240}。当“我”开始意识到自己出落

成人后,“我”就开始算计自己的美了,“穷,可是好看呢!”。这使“我”意识到只要好看,穷是不怕的,妈妈的路也证明了这一点,因为“妈妈也是不难看的”^{[2]240}。美丽成了一无所有的“我”在潜意识中用以抵抗贫穷和孤苦无助的唯一资本。这时候“我”由于校长的帮助,自己的生活已经有了着落,并且可以凭借自己的知识和能力去抄写、去编织新的生活,只要勤劳还是可以维持基本生计的。但当“我”意识到自己随着年岁增长而日渐楚楚动人的容貌时,却在潜意识中拿自己的美当作自己生活的依靠了!这种虚荣想法可能是社会影响所造成的,同时也是一个正常人肯定会受到的影响,但在此读者可以想象:如果“我”长得并不好看,也许就会死了以美貌换取生活来源的最后打算。可能会在生活上断了她的后路,让她一直自食其力并偏离“娼”的轨道。

然而,自食其力的生活并没有维持多久,因为学校要换校长,“我”怕新校长撵,于是开始揣着自己的两块七毛零几个铜子出去找事了,经常是“抱着希望出去,带着尘土与眼泪回来”,但想到自己的好看就“好像已经找到了事似的”。“羞耻不是我造出来的”,这时“我”不是不顾“羞耻”去求得新校长的帮助,而是想到自己的好看,想到还能不顾跟妈妈一样羞耻的生活。“假如我扯着脸不走,焉知新校长不往外撵我呢?我不能等着人家往外推。”^{[2]242}这正是“我”的虚荣、孤傲与倔强的性格在作祟,使“我”顾及校长会撵“我”的“羞耻”而不顾卖身的羞耻,自负地认为脱离了他人的怜悯与帮助自己依然能够找到活路。

离开校长的侄子,“我”又失去了生活的依靠,被人欺骗的愤怒和联想到“小磁人”形同虚设的婚姻的悲凉,使“我”自负地认定:女人相信男人是悲哀的,男人是不可靠的。因此,在陷入绝境时都没有产生通过嫁人改变生存困境的念头。自食其力固然是好,可与出卖自己的心灵和肉体双重折磨的“暗娼”生活相比,也许嫁人也不失为一种寻找出路的无奈之下的好的归宿?

“讲道德”的新官儿肃清“暗门子”,巡警把“我”抓进了感化院。感化院最好的成绩是“已经有十几个女的,经过他们感化而嫁了人”。“有人教给我做工。洗、做、烹调、编织,我都会。”而“我”固执地认为“要是这些本是能挣饭吃,我早就不干那个苦事了。”^{[2]253}经过感化原本可以从良,但因为在“我”看来这是便宜男人了,所以

“我”拒绝感化。在感化院里若有愿意领“我”的男人,至少会衣食无忧,所以“我”完全有可能平稳地走完一生,而“我”选择的却是在狱里不再想出去。

消极的生活态度,使我每每在人生的岔路口面临选择之时,在看似无奈的背后有着隐隐的消极的躲避。“我”多次意识到自己走妈妈那条路只是迟早的事,即便有着不走妈妈老路的良好愿望而尝试改变,但依然先在地认定挣扎努力的徒然和母女命运轮回的必然。

通过文本透视,我们可以看到在《月牙儿》中摆在“我”面前的道路并非只有“我”想象中的那一条可以走,但是由于母亲所走道路的影响以及“我”在那样的生活环境中形成的宿命感的作用,因此“我”在自己对未来的构想中已经预设了种种走向那条道路的可能性。在这种心理暗示的驱使下,我所走的每一步其实都不是对生活的积极有力的反抗,相反,这种心理使“我”认为自己所走的每一步都是在向那条路靠近。既然一开始“我”就已经承认了那条路是不可避免的,在以后的生活中也就失去了面对和彻底反抗它的勇气;“我”可以尽量延缓走向它的时间,“我”可以躲避,但是“我”避不开;在那种社会里,“我”们这样的女人只能“无奈”地走向它。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我”的“无奈”明显有着宿命论的痕迹,“我”的性格中的倔强、自负、虚荣、孤傲等缺陷促成了“我”走“暗门子”的道路的必然。

三

第一人称叙事角度的局限,使作者远离人物而同读者坐在同一位置上,这样就使作者轻易认可了主人公“我”讲述的逻辑,而对其中千回百转的曲折缺少必要的论证。一方面,老舍同20世纪30年代很多作家的创作意图一样,要表现“损不足以奉有余”的社会对女性心灵与肉体的双重摧残,这一创作动机也使他在文本中的一系列情节设置上容易忽略主人公在面对社会与生活时进行其他选择的可能性,而轻易认可了叙述者所作出的“无奈”选择,同时对这种选择行为本身缺乏必要的批判。另一方面,老舍自身独特的情感及生活经历使他创作这一文本时有着某种意欲曲折传达的意旨。

据老舍自己讲,“《大明湖》被焚之后,我把其它的情节都毫不可惜的忘弃了,可是忘不了这一

段。”^{[1]555}毫无疑问,“忘不了”的“这一段”肯定潜隐着作家自己某种极其刻骨铭心的情感体验。之所以“忘不了”,原因大约在于女性主人公的人生遭际,与作家自身在现实生活中的某些切身体验存在必然的联系,产生了强烈的情感共鸣。唯其如此,作家才可能对“这一段”难以释怀,并在旧话重提时融入自己更多的情感体验和深入思考。

首先,初恋情结。除了母亲外,在老舍一生中,有两位女性对他的生活、性情乃至人生价值取向产生过极其深刻的影响,其中之一便是他的初恋对象^{[4]30}。她是刘寿绵(后来出家为僧的宗月大师)的女儿,二人同为师范学校的毕业生。尽管老舍情有独钟,但母亲却为他相中了另外的媳妇。大孝子老舍不想伤了母亲的心,不想使母子间的感情对立,所以这使他左右为难,最后他托人说服母亲,但自己还是因此从心底引发了一场重病^[5]。1923年,刘寿绵办的学校和慈善事业由于经营不善,迅速败落,他不仅自己出家做了和尚,并让夫人和女儿削发为尼。情人削发为尼把他美好的初恋彻底粉碎,也是老舍出走英国的原因之一^{[4]30}。后来,刘小姐不幸被迫卖淫,被人蹂躏,打过好几次胎,最后因打胎死去。可以想象老舍回国后听说昔日的初恋情人沦为娼妓时的感受。我们也可以在他的作品中读出那段情感在他心中的意义——“初恋是青春的第一朵花,不能随便摒弃”(老舍《微神》)^{[2]341}。这段感情在作家的心里是美好而沉重的。初恋失败给老舍心理上造成了永远抹不去的阴影,“是她打开了我爱的园门,我得和她走到山穷水尽”(老舍《微神》)^{[2]341}。这种“情结”的作用是作家的理性创作无法抵制的。因此,在老舍的作品中年轻的娼妓、堕入风尘的女子一般都读过书,卖身都是个被逼迫的过程,这当中暗含了刘小姐的身世和遭遇,《月牙儿》中的“我”也不例外。在《月牙儿》中,作者是借社会的黑暗极力诉说暗含刘小姐影子的“我”的被逼无奈,使我们不难看出他苦心为初恋情人刘小姐走暗娼路辩护的痕迹。文本中饱含真情却无意间流露裂隙的叙述,实则寄寓着作家生命的隐痛。

其次,出身贫寒的生活经历。老舍出生于北京的一个满族平民家庭,幼年丧父,家境贫寒,全家生活仅靠老母一人操劳,每天的两顿饭在困难时只有酸豆汁汤和菜叶子熬成的稀糊糊喝。童年

的老舍可说是饱尝人间艰苦,后来他上学是靠刘善人(刘寿绵)的资助。身边三教九流为生存而作的苦苦挣扎,这些人的生活境遇、情感意绪老舍尽览眼底。随着自己社会阅历的增加、文化视野的拓宽以及社会生活的急剧变化等,他逐渐意识到了造成这些平民境遇的社会文化环境的外在性现实。自己的身世、刘善人对他的影响以及他亲眼所见的底层市民的悲惨生活,使他对底层市民产生了更多的同情与关注。这种拯世救民的人道主义情怀使他更加关注社会底层人民的悲苦,更关注社会如何一步步把人们逼向苦难的深渊。这就使他在面对相同的主题和题材时,表现出与出身名门、更熟悉都市生活的张爱玲等作家不同的价值取向。

再次,主人公际遇与作家现实处境的相似。1934年6月,老舍辞去齐鲁大学的教职,准备从事专业写作。同月,国民党中宣部发布《图书杂志审查办法》,对进步文化采取禁锢和镇压的反动政策。专业写作此路不通。9月老舍又接受了青岛国立山东大学的聘书,重新开始一边写作一边教书的生活。虽然这样的生活不是作家所向往的,但是为了养家糊口,老舍别无选择。他曾经痛心地的表示过:写文章吃不上饭,他爱写作,可那样就得挨饿,又有什么办法呢?1934年10月,挚友白涤洲之死(老舍在《樱海集》序中也曾提到由于有友人的去世心情不佳),加之不能从事专门写作,还有政治上黑暗和民族危机的深重,都给予老舍深切的影响。1935年4月《月牙儿》发表时,老舍正在山东大学任职,也是他为不能如愿以偿从事专业写作而苦闷的时候。如同女主人公本想用自己所学知识独立生存,其结果却是从事了自己一再逃避的职业——暗娼,老舍也有着不能如自己所愿靠当“写家”养活一家人的苦恼,故小说《月牙儿》一改以往的幽默文风,变得缺少微笑而更加深沉、内敛,在耐心、节制、不动声色的叙述中,寄寓生命中触目惊心的转变。小说中一再以感伤包孕隐痛的笔致撕开生活的假面,裸露出生命式微的真相。

综上所述,第一人称叙述视角的运用以及相应使用的“内部聚焦”,使叙述者在《月牙儿》中不再扮演全知全能的上帝角色,叙述者借助于“我”

(下转第62页)

“There be + NP + PP” and “NP1 有 NP2”

YU Bu-li, LI Li

- (1. Foreign Language School, Shanghai Maritime University, Shanghai 200135, China;
2. Department of Foreign Languages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62, China)

Abstract: "There be + NP + PP" and "NP1 有 NP2" are two typical existential constructions in English and Chinese respectively commonly used to indicate stative existence. They are similar in some ways. But they have their own particular characteristics when they are used in their own languages. In this article the author tries to analyze the two structures and to apply the results to the practice of translation.

Keywords: there - be; the existential construction; stative

(责任编辑:李军;校对:沈爱琴,丁小玲)

(上接第46页)

的内心情感流转所知所感,故事随着叙述者“我”心理活动的开始而开始,随着这种活动的结束而结束。这样就在形式上消除了叙述者与读者的不平等关系,使作品的真实感大大加强。但同时我们也应看到此种叙事视角的局限,主人公“我”的身份地位与其作为叙述者的某些叙事话语存在明

显的叙事裂隙,但也正是在这明显存在的叙事裂隙中,我们可以隐约感受到隐含叙述者的存在,窥测到作家某种意欲曲折传达的生命隐痛。小说《月牙儿》的叙述策略在为作品创设平等语境的同时,也给文本预设了许多丰富饱满的意蕴,使读者的期待视野不断得以满足和提升。

参考文献:

- [1] 老舍. 我怎么写短篇小说[M]//老舍研究资料(上). 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
- [2] 舒乙. 老舍作品精典(下卷)[M]. 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8.
- [3] 李玲.《月牙儿》的苦难意识[J]. 辽宁大学学报,2007(4):38-43.
- [4] 蒋泥. 速读中国现当代文学大师与名家丛书[M]. 北京:蓝天出版社,2004.
- [5] 关纪新. 老舍评传[M]. 重庆:重庆出版社,1998:59-60.

Samsara of Fate & Secret Anguish in Life:

——Interpretation of the Narrative Crack of Crescent Moon

DIAO Li-ying

- (1. School of Literature, Suzhou University, Jiangsu Suzhou 215123, China;
2. Office of Scientific Research & Technology, Jiangyin Polytechnic College, Jiangsu Jiangyin 214433, China)

Abstract: The narration of Crescent of Moon has several implications. With the narrative mode of first person and under the exterior concord of inner focus of relative images, the narration shows the marked narrative crack in which the fatality and characteristic defect of the hero and the secret anguish in life obscurely expressed by the narrator can be visibly felt.

Keywords: Crescent Moon; narration; crack; fatality; secret anguish in life

(责任编辑:李开玲;校对:沈爱琴,丁小玲)